

俄國哲學史論文集選譯之五

中國人民大學

史籍  
唯證  
物論  
教論  
研與  
室歷

北京一九五四年

B512

# 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哲學觀點

中國人民大學  
Народ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тая  
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教研室  
Кафедра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ого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материализма

---

俄國哲學史論文集選譯之五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5-ая книга)

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哲學觀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взгляды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

В. Е. 葉夫格拉福夫著

В. Е. Евграфов

譯自國立莫斯科大學哲學系與俄國哲學史教研室編  
『俄國哲學史論文集』，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莫斯科一九五一年版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составленный  
философским факультетом и кафедрой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МГУ.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 1951 г.

北京 一九五四年 ★ г. ПЕКИН, 1954 г.

本書委託新華書店憑證發行

書號：綫2—15  
**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哲學觀點**

---

著者：B·E·葉夫格拉福夫

譯者：中國人民大學  
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教研室

出版者：中國人民大學

印刷者：中國人民大學印刷廠

(本校教材，請勿翻印)

---

一九五四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0001—3416 (340+71+3005)

尼古拉·加夫里洛維奇·車爾尼雪夫斯基是十九世紀俄國解放運動平民知識分子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時期中最卓越的一位革命家。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主要活動時期是在一八六一年農村改革時期及其前夕。正是在那些年份裏，車爾尼雪夫斯基寫下了他在哲學、歷史、政治經濟學、美學、文學批評和政論方面的主要著作，寫下了他對於當時那個時代重要的國際事件的評論，以及著名的長篇小說《怎麼辦？》。

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時代是俄國生活中富有歷史內容和歷史意義的時期。十九世紀中期俄國在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上遭到了非常劇烈的危機。國內經濟發展和階級鬥爭的進程，把變農奴制俄國為資本主義俄國的問題和廢除農奴制的問題當做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問題提了出來。

十九世紀上半紀新的、資本主義的關係在俄國農奴制社會內部逐漸發展起來。這種經濟關係的發展進度雖然是極緩慢的，而且是不讓生產的參加者看見，在自發形成的市場的幕後進行的，然而它的發展却是無可遏止的。這半個世紀為俄國由封建的社會制度過渡到資產階級的社

會制度作了準備工作。

列寧在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一書裏說：國內市場發展的程度就是該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勞動的社會分工是創立國內市場的基礎，因而勞動的社會分工發展的程度決定商品市場關係發展的程度。而交換的發展反過來也對它的生產基礎的發展起着進步的影響。

整個十九世紀上半紀期間，在俄國最佔優勢的商業形式是市集的和隊商的商業。單就尼惹哥羅德市集一地，在一八二五年即售出貨物一千二百六十六萬銀盧布，至一八五二年則售出貨物達五千七百六十萬銀盧布。尼惹哥羅德一個市集的交易之增加三倍以上，說明了全國商品流通增長的情形，因為該市集是『全俄的商場』。當時俄國的非常流動的收購商、牲畜商和布疋商已經成了職業的商人，他們的活動便是各城市和各村鎮大市集的基礎。他們箝制了全國的農民經濟和地主經濟，以商品供應市集，並從市集收購商品供應邊陲各地。

俄國與西歐各國間的對外貿易也與對內貿易同時發展，但速度較對內貿易略慢。下列材料可以證明當時對外貿易不斷成長的情形：十九世紀初，對外貿易的週轉額是一億二千七百八十七萬金盧布；到一八三六——一八四〇年間即增至二億一千九百零五萬三千金盧布；而一八四六——一八五〇年間則上升為二億八千零二萬七千金盧布。以世紀的中期來和初期相比，對外貿易的週轉額增加了一倍以上。

由於俄國國內市場的成長，工業遂與農業分道揚鑣。大部分採用自由僱傭勞動的年輕的俄

國工業部門（紡織業、毛製業等等）獲得了迅速發展。而國內的冶金工業和其他幾個舊有的重工業部門則發展得異常緩慢，它們採用的多半是農奴工人的勞動。

下面的數字可以說明一八〇四——一八六〇年間俄國工業發展和工人人數增加的情形：

年份	工廠 數目 (採鑄、 啤酒各業的 工廠 及磨坊 均除外)	工人數目 (單位：千人)	僱傭工人的百分比 (%)	
			一八〇四	一八三五
一八〇四	二、四〇二	九五·二	四七	五、二六一
一八三五		二一〇·六	五四	一五、三八八
一八六〇		五六五·一	八七	

這些數字不僅說明工業正在生長，而且也說明工業正逐步地具備了資本主義的性質；自由的僱傭勞動在工廠裏取代了農奴勞動的地位。

於是在封建農奴制的內部就產生了資本主義的工業，與農奴制工業並行發展，漸漸又以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和較高級的生產組織形式來襲擊農奴制工業。

俄國工業發展前途的主要障礙是農奴制。在農奴制之下，自由僱傭工人人數的不足，國內市場發展的緩慢，資本積累過程的遲緩等等，全都阻撓着俄國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

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在改革以前的俄國經濟中不僅籠罩了全部工業，而且也延伸到全部農業，無論地主經濟和農民經濟莫不如此。在農奴制之下，農業經濟中佔統治地位的形式是勞役租制。

勞役租制之佔統治地位便表示着自然經濟之佔統治地位，並以下列條件爲其前提：直接生產者『分得一般生產資料、特別是分有土地』，他們被束縛於土地；『農民對地主的人格依賴』，換言之則爲『超經濟的強制』；『極端低下和極端保守的技術狀態，因爲經濟的經營落在小農手中，而小農又爲貧困所迫，因人格依賴和智力落後而受到輕視』（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三卷，第一五八、一五九頁）。西歐各國日益需要俄國的糧食，因此就刺激了俄國農奴主領地的商品穀物生產。同時地主想盡種種辦法用最守舊的方法來提高產量：縮減農戶的耕地面積以擴大佃主的耕地，加強對農奴制農民勞役租工作的監督，提高代役租；總之不惜用一切方法使農奴制的剝削達於頂點。

列寧指出：『在農奴制後期異常發達的那種地主爲出售而進行的穀物生產，早已成爲了舊制度崩潰的徵兆。』（同上，第一五八頁。）這是什麼原因呢？原因在於勞役租制經濟已爲被奴役的廣大農民羣衆所不能忍受。這種經濟制度引起的後果，首先是農民經濟急劇下降，不足以

保證農民維持其半飢半飽的奴隸生活。在全國佔統治地位的、作為社會生產組織者的農奴主地主階級，不僅使俄國的農民經濟陷於崩潰，而且也使整個農奴制經濟體系遭到了深刻的內部的總危機。就連地主經濟本身也日趨沒落，因為地主經濟是全靠剝削農奴來維持的。在改革前夜（一八五九年）抵押出去的農奴佔全體農奴制農民的百分之六十六點四六。地主莊園的負債遽然上增。據歷史學家伊格納托維奇的統計，此項負債還在一八五六年就已達到了駭人聽聞的數字，即超過了二千二百萬盧布。

農奴制的經濟顯然已經十分衰朽，它變成了俄國社會向前發展的主要障礙。

資本主義在西歐各個主要國家內的勝利，促成了俄國農奴制經濟的解體和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的發展。沙皇當時力圖阻止俄國和歐洲其他各國封建制度的解體。馬克思曾經說過：尼古拉一世派遣大軍前往歐洲實行鎮壓，以回答德國一八四八年的資產階級三月革命。「尼古拉一世向國內人民發表了一個宣言，宣稱法國的疫病已經蔓延到了德國，且已接近帝國邊境，革命正瘋狂地以它的目光注視着神聖的俄羅斯。」（馬恩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一編，第一九一頁）

沙皇政府雖尙能克盡其歐洲憲兵的職能，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阻止歷史的必然進程。世界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在上一世紀五十年代引起了意大利、波蘭、巴爾幹、美國、印度、中國、敘利亞及其他各國解放運動的空前高漲。一八五八年——一八五九年歐洲的工業危

機使工人運動擴展起來，並引起了資本主義各國內部矛盾的尖銳化。

沙皇俄國內部矛盾的尖銳化首先表現爲農奴制社會兩個基本階級——地主和農奴之間鬥爭的加強。據內務部的統計，農民暴動的次數在每個十年內都有增長：

一八二六——一八三四年

一四五起

一八三五——一八四四年

二一六起

一八四五——一八五四年

三四八起

一八五五——一八六一年

四七四起

馬克思在一八六〇年一月十一日給恩格斯的信裏曾經指出過俄國農民革命運動的巨大意義：「據我的意見，當前世界上最偉大的事變，首先是自勃朗恩死後興起的美國奴隸運動，其次是俄國的奴隸運動」。（馬恩書信選，一九四七年俄文版，第二一五頁）

沙皇政府利用閹割的方法殘暴地鎮壓掙脫了地主統治的農奴制農民，殘酷地抑制自發的農民暴動。

沙皇政府爲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西歐的革命事變所震懾，因而也就以同樣殘酷的手段來對付城市中的所謂「亂黨」，即做爲當時俄國解放運動主力的平民知識分子。對於文化教育

● 勃朗恩（一八〇〇——一八五九年），美國主張解放黑奴的一位戰士。

的一個新圍剿就是嚴格限制『出身下層社會的青年人』入學。

教學受到了嚴格的監視。在『爲哲學系法學班及第一班事宜訓示大學校長及系主任』的訓令中，聲明必須對教學實行最嚴格的監視，而其中特別要注意的，是那些『以應遭責備之現代精神進行講解且在多數場合適足貽害青年、使之作出謬誤政治概念的學科。此類學科有如：國家法權、政治經濟學……而全部歷史科學，無疑更有可能受其利用』（波羅士丁：十九世紀前半紀俄國的大學。見十九世紀俄國史，格蘭納特出版局版，第二卷，第三七七頁）。

一八五〇年各大學均撤銷了哲學講座，邏輯學和心理學則改由神學教授執教。  
尼古拉一世在位的時期，對於出版界和新聞界說來，是一個『檢查恐怖的時代』。沙皇知道在完全沒有政治自由的條件之下，文學、藝術和時論必定會成爲俄國和西歐思想家們所能用作先進思想和革命思想論壇的唯一畛域。所以尼古拉反動當局特別的注意文學和時評。

政府對作家本人採取了嚴厲懲治的辦法。一八四九年沙皇政府懲辦了『彼得拉席夫』派。還在彼得拉席夫派被捕之前，偉大的俄國諷刺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未來的戰友薩爾蒂可夫·謝德林，即已因爲曖昧的事情這部中篇小說而受到處分。一八五〇年偉大的俄國劇作家奧斯特

● 彼得拉席夫派是十九世紀中葉平民知識分子的一個反農奴制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組織，領導人是蒲大什

洛夫斯基因喜劇自家人好算帳而受到警察的監視。屠格涅夫因為寫了一篇追念果戈理的悼辭而被逐出首都。作家不但不能寫作關於別林斯基和赫爾岑的文章，而且也不得提起別林斯基和赫爾岑的名字。西歐空想社會主義者和唯物論者費爾巴哈的名字和著作，也都禁止提及和禁止刊行。

彼得堡大學教授兼檢查官尼基丁柯在論述俄國新聞業發展的此一時期時說：

『當局宣佈了自己是一切精神發展的敵人，是精神的一切自由活動的敵人。當局雖未取消科學也未取締學術機關，然而却以不顧一切道義的檢查來使我們左右爲難，而使我們突然之間感到個人的內心深處已與外界隔絕，覺得我們自己已經與精神力量所由生長的泥土隔離。』（尼基丁柯：《筆記和日記》，第三六〇頁）

尼基丁柯在談到當時作家和政論家的情緒時又說：

『災星籠罩着所有絞腦汁、搖筆桿的人。密告和暗探把事情弄得更複雜，人人不危而慄，每日均以爲與親朋會聚之末日已經來臨。』（同上，第三七七頁）

若是以爲尼古拉反動時期便是俄國社會思想生活絕對停滯的時期，那可就想得不對了。尼古拉的反動尚有其另外一面。列寧曾論及反動時期說：

『況且，我們革命者從來沒有想要否認反動時期的革命作用。我們知道社會運動的形式是有變化的，人民羣衆直接進行政治創造的時期是和外表上非常寧謐的時期相交錯

的。在那外表寧謐的時期裏，爲苦工和貧困所磨折和摧殘的羣衆或者沉默、或者沉睡（表面上看來是在沉睡），生產方式正在急劇地革命化，人類理性的先進代表者的思想正在總結過去，創立新的體系和新的研究方法……總而言之，人類歷史時期中「思想與理性的時機」之到來，往往有如政治活動家雖係身繫囹圄，但却可以有助於他的科學著作和科學工作一樣。」（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十卷，第二三〇——二三一頁）

別林斯基著名的給果戈理的信，最能代表農奴制農民的心情和企望；任何的迫害手段都阻擋不了這封信在俄國先進社會階層中傳播。

當時不但思想激進的人士，就連各種形形色色的自由派也看出農奴制度是俄國在一八五三——一八五六年克里米亞戰爭中軍事失敗的原因。軍事上的失敗更加激勵了民情。農民反抗地主的起事次數也同時劇增。一個有力的揭露農奴制各種醜惡的運動展開了。俄國地主階級中幾個頗有遠見的政客和理論家憂心忡忡地找尋着擺脫危局的出路。連沙皇專制政體當局也知道必須實行改革，藉以防止即將威脅到他頭上來的革命危險。

正如列寧所指出的那樣，在一八五九——一八六一年間，俄國的革命形勢成熟了。列寧說：

『歐洲民主運動的復活；波蘭人民的民心波動；芬蘭人民的情緒不安；整個出版界和全體貴族都在要求政治上的改革；鑼聲傳遍了整個的俄國，善於以經過檢查過的文章

來培養真正革命家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宣傳，直言不諱到極散發；過去「往往」以武力和流血來強迫農民接受那殘酷新制他們的「法令」，可是現在農民覺醒起來了；貴族——調停官吏集體拒絕使用這種「法令」，大學學生個個不守秩序——在這種種情況之下，最謹慎和最清醒的政客就必得要承認此等革命爆發之可能，而農民起義則是最嚴重的危險。」（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五卷，第三六——二七頁）

當時俄國有兩條可能解放農民脫離農奴制關係的道路。一條是地主階級所主張的道路，以保存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保存地主政權，並在改革期間掠奪農民為前提。資產階級自由派也贊成這一條俄國向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道路，他們和農奴主、地主發生爭論的只是向農民階級實行讓步的辦法和方式。因為他們想要使地主經濟能漸漸地適應於正在發展中的資本主義的各種條件。

另一條是為農民階級所主張的俄國向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農民階級想像自己完全掙脫地主的壓迫和統治，他們想不出任何贖金而能得到全部土地，並為自身之隨同土地一起解放而鬥爭。關於這一點，列寧在一九一一年曾經寫過：

「這些革命的思想不能不在農奴制農民的頭腦裏開始醞釀。數世紀的奴隸壓迫把農民羣衆弄得如此之愚鈍和魯莽，以致於他們到改革時期還只能發動幾次未經任何政治意識鍛鍊的「叛亂」，除了這些零散的、單獨的起義便無所作為。然而即使在當時，俄國

也已經出現了革命者，他們站在農民這一邊，他們懂得那惡名千載的「農村改革」的全部偏狹性與全部可憐相，懂得這一「改革」的全部農奴制的性質。在當時為數頗少的這些革命家中的首要人物，便是尼·加·車爾尼雪夫斯基。」（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十七卷，第九六頁）

由於農民運動的軟弱性、散漫性、自發性和無組織性，結果地主階級贏得了勝利。動手來廢除農奴制和『解放』農民的不是起義的人民本身，而是地主階級和地主專制政府的官吏。因此，在把俄國由農奴制國家變成資本主義國家的鬥爭過程中，形成了兩種歷史傾向：一種是自由主義保皇派的，另一種是革命民主主義的。

列寧在闡明上一世紀六十年代俄國社會中所展開的那個鬥爭的意義和內容時指出：「六一年的革命家都是些單幹的個人，結果自然就一敗塗地。實際上他們却是當時那個時代的偉大活動家。我們離開那個時代愈遠，他們的偉大也就更令我們看得清楚，而當時那些改良主義者也就更其顯得渺小可憐。」（同上，第一〇〇頁）

## 二

尼·加·車爾尼雪夫斯基在一八二八年七月二十四日生於薩拉托夫一個牧師的家庭裏。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家庭並不富有，但在當時薩拉托夫省的社交界却以有教養和有文化而受到尊敬。

尼古拉·車爾尼雪夫斯基自幼即得父親指導，研究希臘和拉丁語言。十歲時他就以個人的博學，尤其是以在社會史、自然史和俄國文學方面的淵博而博得周圍人們的驚歎。從童年時代起，車爾尼雪夫斯基就養成了卓越的語言天才。

一八四四年車爾尼雪夫斯基進薩拉托夫神學校。在神學校時代（一八四四——一八四六年）他以極大的興趣研究了普希金、萊蒙托夫、席勒、狄更斯的作品，以及別林斯基和赫爾岑的哲學和文學作品。車爾尼雪夫斯基在神學校時代就根據祖國紀事雜誌，研究了赫爾岑的論研究自然的書簡和他的小說誰之罪？，研究了別林斯基的論文一八四三年的俄國文學，一八四四年的俄國文學，一八四五年的俄國文學，亞歷山大·普希金的作品和其他著作。

生活本身教導少年的車爾尼雪夫斯基接受別林斯基和赫爾岑的民主主義思想。人民的生

活、人民的力量，正如車爾尼雪夫斯基回憶到的那樣：『從一切方面圍繞着他。』他在童年時代就經常接觸到農奴制時代伏爾加河流域城市的日常生活。

少年的車爾尼雪夫斯基感覺再在薩拉托夫神學校呆下去真是個沉重的負擔。他不想在神學方面發展，終於在一八四六年春離開了那個神學校，前往彼得堡大學入學；希望日後在科學領域中獻身爲祖國服務。俄國赤胆忠心的愛國者別林斯基的光明、宏偉、磊落的形象在前面召喚他前進。

彼得堡大學學生車爾尼雪夫斯基是俄國人民的和他自己祖國的一個熱忱的愛國者。一八四六年在給貝平的一封信裏，他非常沉痛地談到俄國科學界的悲慘情況，談到俄國的科學機構的爲外國人所把持，同時也談到了他內心深處的思想，即關於俄國的偉大的將來和關於俄國人民在全人類文化發展中的作用的思想。

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大學時代，正好是俄國農民在反農奴制壓迫的鬥爭中日趨活躍的時期，同時西歐在一八四八——一九四九年間發生了許多巨大的革命事變。這位偉大的俄國革命思想家的世界觀，就是在這種環境中逐漸形成起來的。

車爾尼雪夫斯基在那些年代裏懷着極大的興趣研究了法國歷史家的著作，特別是法國啟蒙

● 貝平（БЕПИН，一八二三——一九〇四年），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表弟，文學史家，科學院院士。

學者、空想社會主義者的著作；也同樣地研究了英國政治經濟學古典作家的著作和黑格爾與費爾巴哈的哲學著作。但對於車爾尼雪夫斯基世界觀的形成起了決定性作用的，却是他對別林斯基和赫爾岑的作品的研究。

想要了解祖國現狀及其歷史發展道路的願望，引起了車爾尼雪夫斯基對於西歐革命事變的巨大興趣。他覺得從別林斯基和赫爾岑的著作中覓得的關於這根本問題的思想，尤其近乎真理。西歐的革命事變漸漸證實了別林斯基和赫爾岑的結論：俄國需要革命。

『只要我相信我的信仰是正義的，我的信仰必定勝利，那末爲了慶祝我自己的信仰的勝利，爲了慶祝自由、平等、博愛和富裕的勝利，爲了慶祝貧困和罪惡的絕跡，我將毫不吝惜一己的生命；只要我堅決相信我的信仰必定勝利，那末即使我不能親眼看到它的勝利和統治之日，我也毫不遺憾；只要我一旦深信如此，那我雖然身死也覺得心甘。』

（車爾尼雪夫斯基：文學遺產，第一卷，第三四三頁）

『我對俄國的看法大致如此：我迫不及待地盼望着臨近的革命，我渴求革命，雖然我也知道革命會長期地、也可能非常長期地得不到好的結果，可能很長期地只會增大壓迫和貧困……』

（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一九三九年俄文版，第一卷，第三五六——三五七頁）

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爲，俄國革命的內容一天比一天更具備反農奴制的農民革命的色彩。他